

# 由王世杰日記看赫爾利斡旋下的國共談判 (1944.9-1945.2)

陳英杰

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 摘 要

1944 年春當盟軍在歐洲戰場逐步取得勝利時，國民政府的軍隊在中國戰場卻每況愈下。4 月日本發動「一號作戰」(Ichigo Operation)，在中國展開大規模的攻勢。日軍挾著優勢的兵力，從黃河南岸一直攻打到廣西和貴州，重創了國民政府的軍隊，而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卻不斷擴張。國共軍事力量的消長，使得雙方的關係更形複雜。美國在 1944 年 6 月由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造訪重慶後，派遣觀察小組赴延安觀察，9 月初更派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擔任特使，到中國進一步調解蔣介石與史迪威(Gen. Joseph W. Stilwell)的矛盾以及國共間的關係。美國政府認為要控制中國的戰局，必須先解決國共間的衝突並整合中國的軍力以對抗日本。因此，美國希望能夠說服國共雙方回到談判桌上，以和平的手段解決問題。本文將運用《王世杰日記》和其他的年譜、史料，探究赫爾利在抗戰勝利前，斡旋國共關係的過程。

**關鍵字：**談判策略、國共關係、王世杰、周恩來、赫爾利

##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Mediation of Patrick J. Hurle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iary of Dr. Wang Shih-Chieh” (1944.9-1945.2)**

**Ying-Chieh Chen**

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Abstract

During the spring of 1944, the army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losing its ground in China, while the Allied Forces was about to enjoy the fruit of success on the battlefields in Europe. In April, the Japanese army, with its superior force, launched the so-called “Ichigo Operation,” attacking China along the line of the southern bank of Yellow River to the provinces of Guang Xi and Guei Chou and inflicting heavy losses 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rmy.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as gathering its momentum, which further complicated the already entangled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uomintang of China, KMT)-CCP relations. In early September of the year 1944, the U.S. government dispatched Patrick J. Hurley as a special envoy to China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 mediating, meanwhile, the entangled KMT-CCP rela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on the basis of the “Diary of Dr. Wang Shih-chieh” and some materials of chronicles and historical events, into the process in which Patrick Hurley mediated the entangled KMT-CCP relations before the year of victory of 8-year War against Japan (1945).

**Key words:** negotiation strategies, KMT-CCP relations, Wang Shih-chieh, Chou En-lai, Patrick J. Hurley

## 壹、前言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美國被捲入太平洋戰爭，國民政府獨力抗日的情形，終於可望得到更多的外援，但美國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希望中國內部能整合戰力抵抗日軍，以減少美軍的投入與損失。<sup>1</sup>然而，當時的國民政府軍隊一方面要面對日本及其所扶持傀儡政權的侵略，一方面又要處理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擴張的挑戰，在內部派系傾軋、財政窘困和資源不足的條件下，事實上很難單獨對抗日本的侵略。

當1944年春天盟軍在歐洲戰場逐步取得勝利時，國民政府軍在中國戰場卻每況愈下。4月間日本為打通平漢、粵漢兩線的鐵路交通，發動「一號作戰」(Ichigo Operation)，在中國戰場的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展開大規模的攻勢。<sup>2</sup>日軍挾著優勢的兵力，從黃河南岸一直攻打到廣西和貴州，重創了國民政府的軍隊。反觀中共的勢力卻趁機不斷擴張，到了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有一百多萬的共產黨員和九十萬大軍，其武裝力量和國民政府軍已相差無幾。<sup>3</sup>日本軍隊的攻勢影響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的消長，也使得國共關係更形複雜。

美國內部也因此對於中國戰局的發展看法不一，在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造訪重慶後，即派遣觀察小組赴延安蒐集情資。9月6日派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擔任特使來華，進一步調解蔣介石與史迪威(Gen. Joseph W. Stilwell)的矛盾以及國共雙邊的關係。美國政府認為要控制中國戰場，必須先解決國共的矛盾並整合中國的軍隊以對抗日本。因此，美國希望能夠說服國共雙方回到談判桌上，以和平的手段解決問題。

赫爾利在抵達重慶後，隨即奔波斡旋國共雙方的意見，開創了美國政府直接介入國共談判的例子。「第三者」的加入，使得原有國共談判的方式產生了變化，同時也使國共談判的發展增加了新的變數。

國共雙方在美國介入的壓力下，一方面上卓談判，以對美方有所交代；另一方面卻有著各自的考量，不斷的改變議題。國共雙方儘管有美國的協調，但互信基礎始終薄弱，以至在歷經數次談判的努力後，仍是紙上談兵。

自1944年9月赫爾利到中國後，在其斡旋下國共雙方曾在重慶舉行談判，雖然到了1945年2月中旬以破局收場，但國共雙方與赫爾利三者間的互動折衝，對於國共關係或是談判領域的研究而言，仍是一個深具意義的課題。近年隨著部分檔案資料的解禁開放，呈現出更多的史實與題材，此階段國共談判的內容，值得透過更深入的探討，提供給世人參考。

本文將運用《王世杰日記》(手稿本)並佐以其他的年譜、史料作為探討的素材，<sup>4</sup>分就幾個面向進行探討：首先就赫爾利到中國斡旋的背景作一回顧；其次，赫爾利如何與國民政府陣營協商？第三，赫爾利到延安又如何與中共陣營溝通？第四，赫爾利將國共雙方聚集到重慶談判，

<sup>1</sup> 中國軍隊在盟國的作戰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讓日本約有五分之二兵力陷在中國戰場。參閱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臺北：時報，2001年)，頁622。

<sup>2</sup>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4)，(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頁287-288。

<sup>3</sup> 「一號作戰」也稱為豫湘桂戰爭。當時中共軍力的規模參閱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頁1130。

<sup>4</sup> 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陽人，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歷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武漢大學首任校長、教育部長(1933-1937)、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1938-1946)、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1-1943)、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1939-1942、1944-1945)、中央設計局秘書長(1941-1943)、外交部長(1945-1948)、總統府秘書長(1950-1953)、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1970)等。王世杰於1943年10月即奉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之命與董必武就改善國共關係交換意見，並自1944年5月偕張治中代表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林柏渠展開談判。

其如何斡旋爭議？又有何成果？第五，赫爾利擔任駐華大使後是否會影響其斡旋的角色？最後對本階段談判的歷程與結果作一評述與總結。

## 貳、赫爾利到中國斡旋的背景

1944年由於國民政府在豫湘桂節節敗退，震驚美國朝野，基於整體戰局的考量，美國試圖讓國民政府「聯共抗日」，並讓史迪威來指揮中國的作戰。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這樣的佈局碰觸到蔣介石最敏感的「軍權」問題，讓蔣煩悶不已，當時擔任侍從室秘書的唐縱於日記描述：「委座苦悶。……近來對於軍事之苦悶，因羅斯福曾建議以史迪威為委座之實際參謀總長，此為委座最難堪最難處之問題也！」<sup>5</sup>

此時由於美國的壓力，蔣介石的情緒極為焦慮激動，蔣曾問陳布雷：「美國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並在參政會的致詞，避開提及盟邦字樣。<sup>6</sup>到9月底，蔣介石仍為史迪威問題大傷腦筋，「向羅斯福總統要求改派他人來華指揮。……如羅斯福不贊成即決裂亦所不惜。」<sup>7</sup>

由於蔣介石與史迪威間原本就存在若干矛盾，美國為了整合中國的戰力，勢必要先解決蔣、史間的心結，才能夠擴大到和中共談合作。赫爾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羅斯福派來中國負責協調各方矛盾。赫爾利到重慶以後，也很快奔波於各方展開斡旋。不過在蔣介石強力要求羅斯福撤換史迪威的情形下，還是引發中美關係的緊張。10月3日晚間，王世杰和張治中晤見蔣介石，交談中美軍事關係：「文伯詢問蔣先生何故于發電要求撤換史迪威爾參謀長之前，不與文武僚佐細商。蔣先生說係因預知我等不會同意此項辦法。予謂就令如此，蔣先生亦宜先與我等商討。」王世杰擔心蔣介石此強硬舉措，很可能促使美國軍部改變對日戰略，「即暫時置中國大陸于不顧，而直攻日本本土。」<sup>8</sup>王世杰與張治中為此時期蔣介石在決策的重要幕僚，但在撤換史迪威問題上，蔣卻未與王、張磋商，而執意逼退史迪威。最後，王世杰希望：「羅斯福覆電來時，務讓大家參加意見。」<sup>9</sup>王、張希望蔣介石在羅斯福就史迪威問題覆電後，能夠徵詢幕僚的意見，以免中美關係再度緊張。

10月5日蔣介石在和五院院長等人午餐時表示：「我國單獨抗戰時較現在好，以後還是要準備單獨抗戰。」<sup>10</sup>當時孫科在座並未發言，而張治中則認為國民政府的軍隊未必能保住湘桂，但蔣有意放手一搏，讓王世杰覺得事態嚴重。當時在美國的輿論也對蔣介石多所批評，甚為負面。王世杰憂慮的在日記寫道：「近日我已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衝突(邱發表演說指責我軍，我軍事發言人亦公開駁斥之)，蘇聯仍不願與我商談任何問題。現在又因中美聯軍司令人選問題與羅斯福及美軍部衝突，顯然自造孤立狀態，倘此種趨勢不即改正，前途真不堪設想。」<sup>11</sup>當時國民政府的國際處境，可說是相當嚴峻。

赫爾利於6日向蔣介石轉交了羅斯福的覆電，羅斯福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國戰區參謀長職務，但同時要求史迪威繼續留任緬北戰場遠征軍的職務。王世杰認為羅斯福在電報中，對中國甚表不滿，「彼同意解除史迪威爾參謀長之職權及支配租借法案物資之權；但謂中國軍事近更惡化，彼亦不願再負責推薦擔任中國全部作戰軍隊之軍官，其意似擬將中美聯軍司令問題放置；

<sup>5</sup>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4年7月23日記事，(臺北市：傳記文學，1998年)，頁407。

<sup>6</sup>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4年9月10日記事，頁419。

<sup>7</sup>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4年10月6日反省錄，頁423-424。

<sup>8</sup>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3日記事，(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411。

<sup>9</sup> 張治中，字文白，本文依原著文字；史迪威爾即史迪威，下同。《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3日。

<sup>10</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5日記事，頁412-413。

<sup>11</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6日記事，頁413-414。

但仍鄭重提議，將中國在印緬滇作戰部隊指揮權給予史迪威爾。」<sup>12</sup>

到了9日，王世杰向蔣介石建議，不宜再拒絕羅斯福之提議，並於當晚和宋子文會晤，但宋亦主張再拒絕羅斯福的建議：「蔣先生如對此事讓步，則將成爲『傀儡』。」<sup>13</sup>當10日上午王世杰再見到宋子文時，蔣介石已去電羅斯福。宋子文告訴王世杰，前晚晤談後，其再向蔣先生請示，「蔣先生意甚堅決，命其立即發電，昨晚夜半已去電拒絕羅斯福提議矣。」<sup>14</sup>此一情形讓王世杰、何應欽和張治中等人憂悶不已，擔心中美的互信與互助基礎受到影響。

在9日半夜徹底拒絕羅斯福對史迪威的安排之後，10日蔣介石發表雙十演說時，因和美國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其刻意避開反軸心的內容，僅強調「自愛自重，自立自強。」<sup>15</sup>18日蔣介石召集重要幹部研究中共問題，更措辭強硬的指出：「今日美國要求我與共黨妥協，而欲犧牲我國體與人格，若我無限度的一意遷就，此乃由我自棄，烏乎可？故決示以最後之界限，至於美國將來是否接濟，則概可不論；否則患得患失，何以自立，何以濟世耶！」<sup>15</sup>

直到20日羅斯福致電蔣，同意撤回史迪威。史迪威才於21日離渝返美。中美雙方政府約定28日正午同時發布調回史迪威及改派新人的決定。王世杰向蔣介石建議：「政府對於此事不做任何聲明，……否則將使羅斯福總統益窘。」<sup>16</sup>然中美關係顯然因史迪威事件而惡化，更引發美國媒體群起批評。王世杰於11月初的日記提及：「近一、二日美國輿論，對史迪威爾之召回，均于我不利。」<sup>17</sup>「美國報紙群起批評中國，其引火線爲史迪威爾問題。……在批評言論中，多以我政府之不民主、貪污爲言，甚至謂蔣先生不肯用全力抗日，重視對內作戰之準備。」<sup>17</sup>

10月下旬羅斯福改派魏德邁(A. C. Wedemeyer)接任，蔣介石在解除史迪威挑戰其軍權的危機之後，同意讓赫爾利赴延安一行，<sup>18</sup>赫爾利的斡旋才又有望取得新的進展。

### 叁、赫爾利與國民政府的接觸

10月11日下午，王世杰、張治中與赫爾利談論中共問題。王世杰發現赫爾利對國共問題的商談頗熱衷，但認爲「中共態度益趨極端，逐漸增加其要求，故予等尙不擬即赴延安。」<sup>19</sup>不過王世杰也開始思考，如何運用赫爾利的「熱忱協助」，來打破國共談判的僵局。

13日晚間王世杰等人在蔣介石的官邸，「商議宜否由赫利將軍出面調解政府與中共間之糾紛。蔣先生傾向於請其出任調解。」王世杰並說明赫爾利曾提到「已受羅斯福之指示，將出面促成此事之解決。」王又提出三點意見，並獲得蔣介石的同意：「(一)赫氏暫不赴延安(予與文伯亦暫不去延安)；(二)赫氏可約在渝之林祖涵、董必武一談，告以美國態度及蘇聯對赫氏之表示；(三)如中共願意美國調解，彼將於請求中國允許之後，提出解決方案。」<sup>20</sup>王世杰於14日下午就把預擬和赫爾利協調的要點請蔣介石核定，以供赫氏將來提出解決方案的參考。

爲緩和國共間的關係，16日下午由邵力子出面宴請王世杰、張治中、林伯渠、董必武、冷遹和胡霖等參政員聚餐。張治中在餐後力斥中共邀請國民政府談判代表等人赴延安並無誠意，

<sup>12</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8日記事，頁416-417。

<sup>13</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9日記事，頁417。

<sup>14</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10日記事，頁418。

<sup>15</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4)，1944年11月18日，頁189。

<sup>16</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28日記事，頁432。

<sup>17</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1、2日記事，頁435-437。

<sup>18</sup>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4年10月24、25日記事，頁426。

<sup>19</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11日記事，頁419。

<sup>20</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13日記事，頁420。

「謂其一面邀請，一面在延安報紙攻擊予等之手段『無賴』。」王世杰當場出示並傳閱林祖涵等在西安簽字的文件，以反駁林在參政會及新華日報的言論。<sup>21</sup>

17日上午十時王世杰交給赫爾利一份談話稿，赫爾利則告知有關羅斯福對華政策的指示：「(一)促進中國統一，以免戰時或戰後發生內戰；(二)盡力支援中國軍隊之作戰力量以減少美國未來在中國戰場之犧牲；(三)蔣先生與史迪威爾間之意見雖有衝突，但美國政策必繼續與蔣先生合作，支持其領導地位。」赫爾利言明羅斯福賦予其到中國的任務為：「促進中國統一，與維護蔣先生領導地位。」<sup>22</sup>赫爾利同意接受王世杰所提的談話稿，並在當天第一次約見了林伯渠與董必武。當日林、董致電延安，報告與赫爾利的談話要點：「他(赫爾利)約林、董談話是蔣介石允許的，蔣也允許他必要時去延安；中共軍隊組織、訓練都好，力量強大，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種因素；蔣介石為抗日的領袖，是全國公認的事實。」赫爾利意圖向林、董表明美國支持蔣介石的立場，其出面斡旋亦已得到中美雙方政府的授權。<sup>23</sup>

赫爾利於18日再次約見林伯渠與董必武，林、董於會後致電毛澤東報告談話情況，說明赫爾利對國共談判的安排：「他(赫爾利)擬約張治中、王世杰和我們談，得出兩黨合作初步結果後，他擬向蔣介石談。蔣同意後，他便到延安來和毛澤東談，求得雙方合作的基礎。最後蔣、毛見面，發出宣言，兩黨便合作起來了。」<sup>24</sup>

赫爾利在19日欲約集國共雙方代表在其寓宅會談，王世杰表示：「此甚不便，亦無益。」赫爾利表示他已力勸林、董：「林、董表示願求得統一，並謂中共願擁護蔣委員長。」王世杰回應此種表示為彼等一貫之言詞，而且中共所提出之統一條件，時時變更，且多為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條件。赫爾利以美軍可能在中國海岸登陸等為由，提到：「如屆時中國仍然分裂，中共在美軍登陸地區之軍隊不受中央政府指揮，則美軍將如何應付？」王世杰表示：「予與文伯暫不與林、董在赫氏寓宅晤見，但予將擬一解決中共問題方案，請其考慮後以彼之名義提出。」赫爾利則認為：「承認中共為政黨及承認實行民主政治兩點似不能不列入。」赫爾利也說明會事先取得王世杰等的同意，才提出協議的條款。當晚，王世杰與蔣介石商議，蔣表示：「不妨即時承認中共之合法地位，任其公開。」<sup>25</sup>

同日，毛澤東在林、董的電函上寫下一段批示：「9月下半月至10月上旬，蔣對羅、邱壓力，硬抗了幾個星期。在此期間，對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雙十演說出了一通氣之後，又軟下來。對美國軟，對我方亦隨著軟些。邵力子召集的國、共及中間三方會議，決定派五參政員來延及要求延安停止罵蔣等，即其表現。蔣最怕指名批評他，美國亦怕我們不要蔣，故在許蔣存在條件下，可以做出一些有利於我們的交易來。」<sup>26</sup>

王世杰於20日向蔣介石請示中共問題的解決方案，並於21日提給赫爾利參考。赫爾利閱後多表贊成，僅「對於陝北邊境雙方撤退軍隊一條，略有意見。」<sup>27</sup>

赫爾利在23日第三次約見林伯渠、董必武。次日林、董向延安報告：「赫爾利說，蔣介石21日交給他一個方案，被他當場退回。至於方案的內容，他保守秘密。……他問蔣為什麼不可以和共產黨並肩作戰？」<sup>28</sup>赫爾利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對象，多採附和的態度，以爭取認同，因而迅速奠定他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的地位。

<sup>21</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16日記事，頁421-422。

<sup>22</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16日記事，頁423。

<sup>2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0月17日，(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551-552。

<sup>24</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0月18日，頁552。

<sup>25</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19日記事，頁425-426。

<sup>26</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0月17日，頁552。

<sup>27</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0月21日記事，頁428。

<sup>28</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0月24日，頁552。

在國際輿論不利於國府陣營的情形下，11月3日上午，張治中、王世杰與赫爾利再度磋商中共問題，赫爾利表示：「在美之美國軍官及外交官均勸其勿作調解之嘗試，因中共實不願與腐敗之國民政府妥協。」但赫爾利自己則決意嘗試，並擬於日內赴延安與毛澤東面談，王世杰等人亦贊同其前往，但要求要先取得蔣介石的同意。<sup>29</sup>隔天晚上，王世杰對蔣介石報告赫爾利赴延安之事：「予謂彼此項計劃必已先徵羅總統之同意。故予日昨贊成之。倘此舉終歸無效，美政府對我政府之疑怨，當可稍減。」在聽完王世杰的分析後，蔣介石也贊同由赫爾利赴延安擔任調人。<sup>30</sup>

毛澤東得知赫爾利即將來延安後，11月6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討論赫爾利到延安一事。毛說：「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至於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赫爾利來我們要開個歡迎會，由周恩來出面介紹，再搞點音樂晚會。」<sup>31</sup>

6日晚間赫爾利向蔣介石提出「協議之基本條件」共五條談判方案。7日上午王世杰、張治中「先往蔣先生商議，旋往赫氏寓宅詳商，當將原件略加修正，仍為五條，交彼帶往延安磋商。」談判方案的主要內容包括軍令統一；中共軍隊與國軍待遇平等；擁護三民主義，並力促民治之實現；承認中國共產黨之合法地位等項。<sup>32</sup>

## 肆、赫爾利與中共在延安的談判

赫爾利與林伯渠於11月7日下午赴延安，到10日才由延安返渝，其間赫爾利與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進行了四次的談判。

在8日上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赫爾利舉行了第一次正式談判，赫爾利首先說明：「自己是羅斯福委託的私人代表，來談判關於中國的事情。這次來延安，還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和批准。」赫爾利並向中共遞交「協議之基本條件」。<sup>33</sup>毛澤東當即詢問：這五條代表了何人的意思？赫爾利一會兒說是他自己的觀點，一下子又改口說是我們大家制訂出來的。<sup>34</sup>

當日下午3時雙方舉行第二次談判，毛澤東表示：「中國需要在民主的基礎上團結全國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組織，迅速來一個改變，這是解決問題的起碼點。……因此必須改組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合國民政府。」關於改組軍隊，毛則認為：「我以為應當改組的是喪失戰鬥力、不聽命令、腐敗不堪、一打就散的軍隊，如湯恩伯、胡宗南的軍隊，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不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及不妨礙民主的基礎上，我們願意和蔣介石取得妥協。」毛澤東接著對赫爾利所提出的協議案進行修改，包括改組國民黨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改組統帥部為聯合統帥部、共產黨軍隊的指揮、增加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以及要求承認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等。<sup>35</sup>

雙方於9日下午3時起舉行第三次談判，討論經過中共修改後的協定草案。赫爾利說：「我將盡一切力量使蔣接受，我想這個方案是對的。」赫爾利並表示願意陪毛澤東與蔣介石會面。毛表示：「我還不了解蔣先生是否會同意我們的五要點。他如同意，我即可與他見面。」會後赫、

<sup>29</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3日記事，頁437-438。

<sup>30</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4日記事，頁438。

<sup>31</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1月6日，頁555。

<sup>32</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7日記事，頁439-440。

<sup>33</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1月8日，頁556。

<sup>34</sup> D. 包瑞德，《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北京市：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頁76。包瑞德陪同赫爾利參加在延安的四次會談。

<sup>35</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1月8日，頁556-557。

毛雙方商定把文件準備好，以備隔天簽字。<sup>36</sup>

當天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毛向全會報告和赫爾利的會談情況，指出：「經過三次會議修改後的五點協定，沒有破壞我們的解放區，把蔣介石要破壞解放區的企圖掃光了；破壞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使共產黨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黨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這個協定，就是他最大的讓步。明天簽字後，我們的文章做完了，問題即在重慶了。」<sup>37</sup>周恩來在會議上也提出：「蔣介石認為我們參加政府和成立聯合政府是有區別的，赫爾利則將兩者混而為一，所以他以為蔣介石不至於為難。估計蔣介石必定會對這次會議做出的協定提出修改。」<sup>38</sup>

10日上午10時赫爾利與中共陣營進行第四次的談判。毛澤東首先請赫爾利將該協議文件轉交羅斯福，表示該協議文件已得到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通過，並派周恩來先和赫爾利同去重慶。中共在該協議中以「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為主軸，試圖透過改組政府和成立聯合國民軍事委員會來爭取承認其政黨和擁有軍隊的合法性基礎。<sup>39</sup>毛澤東、赫爾利分別在新的五點協議《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協定》上簽字。<sup>40</sup>簽字之後，周恩來提醒赫爾利，協議的條款必須先交給委員長，而不能讓宋子文或其他任何的國府官員先看到。<sup>41</sup>當日，周恩來與赫爾利、包瑞德(David D. Barrett)等同機飛抵重慶。

## 伍、赫爾利與國共在重慶的談判

周恩來到重慶談判之際，中國的戰局再度發生重大變化。自8月衡陽陷落後，日軍攻勢轉向廣西桂林。11月10到12日桂林、柳州相繼失守。王世杰當時曾在日記悲觀的寫下：「陪都人心亦不免浮動，因懼敵軍悉力西進也。」<sup>42</sup>

11日上午赫爾利將新的五點協議交給了宋子文和王世杰，當即引起宋、王極度不滿。王世杰閱後責問：「何不堅持彼原提議五條，彼謂彼已堅持但無效，因改定如此。予謂此大不妥，彼頗懊喪，但不免為中共辯護。予與子文旋往蔣先生處報告並略商，未作決定。」王世杰對赫爾利斡旋的方式表示憂慮，但仍向蔣介石提醒：「不可使赫爾利成為史迪威爾第二。」<sup>43</sup>

蔣介石、宋子文和王世杰於12日下午再對赫爾利的新協議進行討論與修改，並希望「改定文件由赫爾利以彼之名義提出，作為彼之最後主張。」<sup>44</sup>13日上午11時，王世杰與赫爾利面商修改協議問題，王表示：「協定中『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等名稱必須刪改。」<sup>45</sup>並由王世杰再擬一修正協定案，以便和赫爾利進行細部商討。

王世杰與張治中在14日上午擬妥修正協定案，並向蔣介石報告：「對於邀共產黨人員參加

<sup>36</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1月9日，頁557。

<sup>37</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1月9日，頁557。

<sup>3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4年11月9日，（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587。

<sup>39</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44年5月—1945年1月國共談判史料（續）〉，《民國檔案》第3期，（南京：民國檔案雜誌社，1994年），頁29。

<sup>40</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1月10日，頁5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572。

<sup>41</sup>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頁82。

<sup>42</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14日記事，頁444。

<sup>43</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11日記事，頁442-443。

<sup>44</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12日記事，頁443。

<sup>45</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13日記事，頁444。

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一節，擬不明白列入協定中，但擬口頭向赫爾利及中共作此然諾。」<sup>46</sup>國民政府陣營將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改為參加政府、參加軍事委員會，以便能繼續掌握政權與軍權，赫爾利卻將兩者混為一談。

王世杰於 15 日上午將協定修正案面交赫爾利，赫爾利閱後面露難色，謂：「美國政府之意在『救助中國』，但近來中國內外形勢日非，美國政府于其對華政策之前途斷無把握。」王世杰表示：「甚了解美國的善意」，但因國民政府無法控制局勢，加上爲了防範中共不擇手段，而對若干事項持慎重態度。<sup>47</sup>

到了 20 日，周恩來已察覺國民黨不會接受赫爾利由延安帶回的五點協議，周致電毛澤東：「蔣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聯合統帥部，請客式政府，決不會答覆協定。我們須以聯合政府及解放區委員會去逼求。」<sup>48</sup>

對於赫爾利調解國共協商的方式，蔣介石亦頗不能釋懷，其認爲：「共黨本爲一破壞抗戰之賣國叛徒……而今美國竟視爲中國抗戰之重心，強迫我政府非與其妥協不可，天下事之顛倒是非，淆亂邪正有如此之甚者，實屬夢想不到，恐爲有史以來所罕有之怪事。」<sup>49</sup>蔣介石甚至認爲美國的作法，有如侵犯國體人格，蔣道：「今日美國要求我與共黨妥協，而欲犧牲我國體人格，若我無限度的一意遷就，此乃由我自棄，烏乎可？故決示以最後之界限，至於美國將來是否接濟，則概可不論，否則患得患失，何以自立，何以濟世耶！」<sup>50</sup>

由於赫爾利的態度搖擺，王世杰認爲赫爾利有欠穩練，但爲爭取美國的支持和維繫國共的溝通管道，而仍持續與赫爾利協商。21 日上午王世杰和張治中到赫爾利宅邸，將與宋子文共同修正的協議草案交給赫爾利。但赫爾利大發牢騷：「(國民)政府不願求得解決，而中共則希望覓得解決。並指責(國民)政府委過失於彼(赫爾利)爲不當。……如此事無結果，彼只好返美云云。」折騰一陣，赫爾利最後才說：「願將政府修正案持示周恩來，並與周恩來作更大之奮鬥。」<sup>51</sup>

此次國民黨方面提出的修正案共爲三條，主要內容爲：第一，集中與統一中國境內軍事力量，將中國共產黨軍隊加以整編，列爲正規國軍，國民政府並承認中國共產黨爲合法政黨。第二，中國共產黨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國民政府並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事委員會。第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加以保障人民自由等。<sup>52</sup>

當日，赫爾利將上述的協定草案轉交周恩來。周恩來問赫爾利，國民政府方面是否仍同意以組織聯合政府爲前提？但赫爾利未正面回應，以其只是談判的見證人而非當事人來迴避。周恩來又問中共是否只能處於觀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實權？赫爾利也模糊的回答：「並不等於有實權，但事在人爲。」<sup>53</sup>周恩來表示即將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報告。會後周恩來電告毛澤東當天會談的情況，毛批：「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制我軍」<sup>54</sup>。對國民政府的方案並不領情。

王世杰於 22 日上午先到赫爾利宅邸，周恩來與董必武、宋子文陸續到場。此爲赫爾利斡旋國共關係以來，雙方代表首次直接見面。會談中，周恩來表示：「對於政府方案未容納『聯合政府』主張，表示不能贊同。」並要王世杰對承認中共爲合法政黨之意義，及對於中共參加政府一事做說明。王世杰表示：「政府或將制定政治結社法，……黨外人參加政府工作事，國民黨原

<sup>46</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14日記事。頁444。

<sup>47</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15日記事，頁445-446。

<sup>48</sup> 《周恩來傳》，頁574。

<sup>49</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4)，1944年11月15日，頁188。

<sup>50</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4)，1944年11月18日，頁189。

<sup>51</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21日記事，頁450-452。

<sup>52</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日期》第5篇(4)，1944年11月21日，頁293-294。

<sup>53</sup> 《周恩來傳》，頁575。

<sup>54</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1月21日，頁560。



無排斥之意，惟在法律上國民黨如宣告結束訓政或黨治，則事涉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之變更，自非經過黨代表大會不能決定，即蔣先生亦無自由決定之權。」<sup>55</sup>當日下午，周恩來與董必武在王世杰的陪同下，拜會蔣介石，蔣表示中共要交出軍隊，政府才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周恩來則堅持聯合政府主張，指出政府是內閣，並非國家，不稱職，就應該改組。<sup>56</sup>由於周恩來態度強硬，蔣介石覺得：「觀周之態度，已不如從前恭順矣！彼等當危急之際，忽得美國意外之拯救，乃自認為此次交涉已完全勝利矣。」蔣並認為王世杰未審內容就讓中共發表合作聲明，實有不妥。<sup>57</sup>

毛澤東在23日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時表示：「來一個協定，去一個協定，現在又來一個協定，我們堅持同赫爾利在延安簽訂的協定是有道理的，現在蔣介石不同意，要發動一個尖銳的批評。」<sup>58</sup>同日赫爾利轉告王世杰，周恩來與董必武將回延安一趟。

周恩來於12月7日返回延安，臨行前告訴邵力子：「政府不接受『聯合政府』辦法，此次商議恐怕無結果。」<sup>59</sup>到了11日赫爾利向王世杰出示周恩來的信件，周表示不願意回渝，且說明之前所提的五條內容為中共最低之要求。<sup>60</sup>

面對未決的協議，王世杰和宋子文都催促赫爾利去電詢問中共是否願意繼續談判。至12月18日下午，蔣介石約赫爾利、宋子文及王世杰就中共問題，研擬新方案。之後幾天則繼續由宋、王及張治中研議。<sup>61</sup>

赫爾利調停國共關係的第一階段，在周恩來返回延安後而告一段落。赫爾利是在國共談判處於僵局時介入斡旋的，儘管其努力奔走，促成國共再次直接談判，但由於赫爾利對於中國政治的了解不夠深入，要缺乏互信的國共雙方在敏感的政權和軍權上妥協，是非常困難的。

## 陸、赫爾利擔任駐華大使後的國共談判

正當國共在重慶的談判陷入僵局之際，11月29日赫爾利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駐華大使。此時國民政府軍正連吃敗仗，重慶局勢浮動。12月2日，日軍攻占貴州獨山，幸而這已是日軍「一號作戰」的最後一擊。6日，王世杰在日記載：「戰事形勢可慮。敵軍自桂邊進入黔省，幾乎毫未遇抵抗。獨山為險要，已于二日被敵佔領。我軍尚未集中貴陽，且亦不卜其戰鬥力如何。予語子文、天翼，應對可能之危險早定一切計劃。」<sup>62</sup>所幸國民政府軍在5日至8日陸續克復八寨、三合和獨山，情勢轉趨穩定。<sup>63</sup>

12月7日，在周恩來與董必武飛返延安當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聽取了周恩來關於此次和國民黨談判的報告：「國民黨所提三條明顯地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因此無法求得雙方提案的基本共同點。」中共方面準備公開與赫爾利在延安達成的五點協議，並決定周恩來和董必武不再去重慶談判。次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包瑞德進行會談，堅決

<sup>55</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1月22日記事。頁452-454。

<sup>56</sup> 《周恩來年譜》1944年11月22日，頁589。

<sup>57</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4），1944年11月22日，頁189。

<sup>58</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1月23日，頁560-561。

<sup>59</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2月8日記事，頁465。

<sup>60</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2月11日記事，頁467。

<sup>61</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2月11、18、19、21日記事，頁467、471-473。

<sup>62</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2月6日記事，頁463。

<sup>63</sup>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4年12月11日記事，頁437。

拒絕蔣介石的三點建議，更批評赫爾利背棄與中共簽署的五點建議而為蔣介石做說客。<sup>64</sup>

由於中共打算公布與赫爾利的五點協議，讓赫爾利覺得難堪。王若飛特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和董必武，說明赫氏感到很惱火。周恩來於 12 日回覆王若飛：「我們毫無與美方決裂之意，五條協定草案可以不發表。『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sup>65</sup>

國民政府方面此時對談判提案和策略做了調整的準備。<sup>66</sup>蔣介石在 18 日約見赫爾利等人，續商中共問題並草擬新方案。<sup>67</sup>新草案於 21 日上午由陳誠、張治中與王世杰擬出，在原來三款方案外，「允許黨外份子參加國防最高委員會及行政院；至於中共軍隊之整編及指揮，則不妨暫使美國軍官參加。」<sup>68</sup>新方案將原來的口頭承諾中共參加政府，改為文字承諾。並將中共一切軍隊移交由美國人指揮。

赫爾利旋於 21 日致電毛澤東，希望周恩來到重慶談判。22 日，毛覆電赫爾利，表示周恩來不能到重慶，並表示以後談判應在延安舉行：「在目前，吾人認為國民政府尚無根據我們提議的五條方針來進行談判的誠意，而周恩來將軍又因有某種會議需要準備，一時難以抽身，故我們提議請你先派包瑞德上校來延一談。」<sup>69</sup>

25 日上午，赫爾利將中共方面的邀約轉告國民政府方面，王世杰在日記載：「今晨赫爾利語宋子文，謂毛澤東來電，周恩來現時不能來渝，以後談判彼提議於延安舉行云云。中共態度之日趨惡劣可以概見。但予意認為我政府仍應以寬忍態度應付此事，至少藉以取得美國政府之同情。」<sup>70</sup>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國共雙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做給美國人看的。

赫爾利在 30 日致電延安表示：「深信國民政府之誠意，為獲得解決，願做相當讓步。」赫爾利提出二點建議：「(一)行政院宋代院長子文、王世杰博士、張治中將軍及余本人，同赴延安，做短期之勾留，與閣下面商一切；(二)若原則上已獲同意，則毛主席及周將軍應與吾人同回重慶，以完成協定。」<sup>71</sup>次日，周恩來回函赫爾利，要求政府：「(一)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等政治犯；(二)解除陝甘寧邊區之封鎖；(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之律令；(四)取消特務警察。」<sup>72</sup>周提出更繁細的提案，意圖讓國民政府陣營更費神應付。

為回應中共陣營的訴求，蔣介石在 1945 年元月 1 日的元旦文告指出：「為了早日確定國家憲政基礎與百年大計，我覺得我們國民大會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sup>73</sup>我現在準備建議中共，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就要即時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sup>74</sup>關於蔣介石提前召開國民大會的構想，最初是隨著聯合政府的提出而產生的，並隨著聯合政府的爭論，逐步形成定見。<sup>74</sup>

<sup>64</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2月7、8日，頁563。

<sup>65</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2月12日，頁564。

<sup>66</sup> 對於中共方面似乎有意拖延談判，赫爾利表示不滿。但在國民政府內部卻對宣傳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王世杰主張「宣傳應配合政策，因此主張對共黨不必還罵！對蘇聯不必刺激」，但黨內部分人士則大不以為然。參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4年12月12日記事，頁437。

<sup>67</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94年12月18日記事，頁470-471。

<sup>68</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94年12月21日記事，頁473。

<sup>69</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4年12月22日，頁568。

<sup>70</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1944年12月25日記事，頁475。

<sup>71</sup> 《中華民國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4)，頁297。

<sup>72</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12月31日記事，頁479-480。

<sup>73</sup>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5年1月1日，(臺北：國史館)，頁475。

<sup>74</sup> 例如在9月15日，林伯渠在參政會首次公開提出聯合政府主張後，蔣介石在16日於參政會便說：「本席正在考慮提議在明年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果到那個時候，抗戰形勢好轉，憲政或有提前實施的必要」。參閱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0，(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84年)，頁507。王世杰日也記載：「今日蔣先生在參政會講話，強調實施憲政之決心，並準備提前其期限……措辭與態度使全場

1月4日晚間蔣介石告訴王世杰：「可于行政院成立一個『戰時行政會議』，即一種戰時內閣，由七人至九人組成。中共及其他黨外份子可參加此會議。囑予起草條例(此一計畫意在容納中共所謂『聯合政府』之要求，而謀中共問題之解決)。」<sup>75</sup>蔣介石試圖以提前實施憲政與戰時內閣，對付中共聯合政府的要求。

爭取政權，一直是國共雙方談判的焦點，中共以「聯合政府」和「解放區聯合委員會」作訴求；國民黨則以「戰時內閣」和「提前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做因應。5日晚間，王世杰、宋子文與赫爾利一起研討中共問題，並「商定由赫氏電覆毛澤東，並建議請子文及予與張文伯赴延安一行。」<sup>76</sup>由於中共不願派代表到重慶繼續談判，國民政府方面準備改採主動，赴延安談判。

赫爾利在11日收到毛澤東的覆函，此時毛澤東仍「不欲赫利、宋部長及予(王世杰)與文伯等赴延安，以免徒勞往返，並謂彼覺繼續秘密會商為無益之舉……此一變化又為出政府預料之外。」<sup>77</sup>毛的盤算是：「在重慶召開國事會議之預備會議，此種預備會議應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政團同盟三方代表參加，並保證會議公開舉行，各黨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毛並表示如國民黨同意這一提議，周恩來可到重慶磋商。<sup>78</sup>

由於周恩來回延安後態度大變，對從前所談者，均不承認。其後所提四條，美方亦認為過分。<sup>79</sup>這段時間因赫爾利和國民政府高層有較多的接觸，其態度與看法漸傾向國民政府，使得中共暗表不滿。<sup>80</sup>對於國民政府方面提出的「戰時內閣」議題，蔣介石並不急於亮牌，而是讓中共及其他黨派先表態，才再做進一步的確認。<sup>81</sup>

赫爾利於20日再度致函毛澤東，說他相信國民黨政府準備做出重要讓步，建議再派周恩來到重慶談判。22日毛覆電赫爾利，同意派周恩來赴重慶代表中共談判。<sup>82</sup>行前，毛澤東對其指示三點：「(一)爭取聯合政府，與民主人士合作；(二)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具體步驟，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參加；(三)要求國民黨先辦到以下各項：釋放張學良、楊虎成、葉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實現一些自由，取消特務活動。」<sup>83</sup>

周恩來於24日動身飛往重慶前，為了擴大宣傳，先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講話：「這次去重慶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國民政府、國民黨和民盟提議，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國事會議的預備會議，以便正式商談國事會議和聯合政府的組織及實現的步驟問題。」<sup>84</sup>周恩來此番吸引媒體的動作，在國民政府陣營看來為「仍然昔日濫調，毫無誠意，其無結果，可想而知。」<sup>85</sup>當天下午王世杰與赫爾利到機場接機，晚間在宋子文宅邸，雙方面進行了數小時的會談而無結果。周恩來主張：「須先召集『各黨派會議』，並宣告『黨治』之廢除，然後能成立彼所提議之『聯合政府』。」因此，中共不願參加國民黨黨治下之「戰時內閣」。王世杰認為周恩來之意在拖延，無求解決問題之誠意。但赫爾利卻因不甚明瞭了情況，而和宋子文有激烈的爭論。<sup>86</sup>

25日周恩來先同赫爾利會晤，赫爾利將前晚與國民政府商談的五點內容提出：「(一)去年11

---

感動。」參閱《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1944年9月16日記事，頁400。

<sup>75</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4日記事，頁475。

<sup>76</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5日記事，頁3。

<sup>77</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11日記事，頁7。

<sup>78</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5年1月11日，頁572。

<sup>79</sup>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1月9日記事，頁445。

<sup>80</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19日記事，頁13。

<sup>81</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20日記事，頁13。

<sup>82</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1月22日，頁597。

<sup>83</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5年1月22日，頁574。

<sup>84</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1月24日，頁597。

<sup>85</sup>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1月25日記事，頁448。

<sup>86</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24日記事，頁16。

月 21 日的三條仍要做；(二)行政院下設各黨派參加的戰時內閣性的新機構；(三)成立有國民黨、共產黨、美國各一人參加的整編委員會，整編中共軍隊；(四)為中共軍隊設一美軍官作總司令；(五)國民政府承認中共合法。」周恩來予以拒絕，聲明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sup>87</sup>午間宋子文、王世杰、張治中加入商談，周恩來堅持先解決「一黨包辦問題」，<sup>88</sup>談判無結果，王世杰遂將國民政府方面的三項辦法交給周恩來，請其考慮後答覆。該三項提議為：「(一)組織類似戰時內閣性之政務會議于行政院，俾各黨派均能參加；(二)組織中共軍隊整編委員會，由中央將領、中共將領及美軍交各一人組成；(三)組織中共軍隊總指揮部，由政府提美國軍官一人為總指揮，以中央將領及中共將領各一人為副。」<sup>89</sup>

周恩來在 26 日對赫爾利表示，國民政府提出的五項條款並不公平。<sup>90</sup>周恩來仍堅持前議，特別是對其原則的堅持，即「聯合政府必須是廢除黨治後之各黨派政府。」但一方面也表示可就王世杰原提五項略加修改。王世杰等則希望：「不應斤斤于『黨治』廢除之形式，因此事牽涉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之修改。國民黨還政于民之時，必須以國民代表大會為接受之機關，不能以『各黨派會議』為接受者。」<sup>91</sup>

中共此次特意將談判訊息公開，企圖透過媒體營造其民主形象，周恩來並在重慶與民主黨派和各界領袖積極接觸。<sup>92</sup>使得王世杰對民主黨派部分人士大表不滿：「午後黃炎培、李璜來談，予與邵力子先生均責民主同盟不應隨時附和中共，忽視其素所主張統一與團結。」<sup>93</sup>

在國民政府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在 1 月 28 日孫科邀宴各黨派人士時，<sup>94</sup>就痛斥國民黨，力言國共必須合作，國民黨必須容納中共，並贊成周恩來提議的國是會議等。面對孫科這一番話，王世杰婉轉的講了三點意見：「(一)孫哲生先生在黨內外如此指斥本黨，足見國民黨黨內空氣之自由，並非如外間所言，黨內無民主。(二)國共雙方必須互讓才能合作。(三)予希望其他各黨中亦有人如孫先生，以客觀態度考慮已黨之是非功過。」<sup>95</sup>

30 日王世杰、張治中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口頭承認應結束依黨統治，……王、張表示傾向于召集黨派會議」，周恩來追問會議的成分與內容，並提出成分應是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三方，內容應是討論結束一黨統治、共同綱領、改組政府。<sup>96</sup>

2 月 1 日晚，邵力子邀集周恩來、王若飛、孫科、王世杰、左舜生、黃炎培等三方人士繼續商談。當晚蔣介石也召開會議商討中共問題，有陳立夫、吳鼎昌和王世杰等人參加。王世杰力陳：「政府必須以最大之忍耐與努力求取『政治解決』政策之成功。」但張群反對王的看法，王又形容說：「共產黨是一種病菌，在太陽下便死亡，在黑暗中便發育；本黨應一面健全自己的政治，一面允許中共公開活動，如此我們便可以戰勝中共。如純賴軍隊或特務警察與之鬥爭，則成功難而失敗易。」<sup>97</sup>

周恩來在 2 日根據毛澤東電告的內容，起草關於黨派會議的協定草案，內容是：「黨派會議應包含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權討論和解決結束一黨統治、改組政府、起草

<sup>87</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1月25日，頁598。

<sup>88</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1月25日，頁598。

<sup>89</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25日記事，頁17。

<sup>90</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1月26日，頁598。

<sup>91</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26日記事，頁18。

<sup>92</sup> 例如周恩來在1月26日下午與民主同盟、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和社會名流四十多人座談；28日又招待產業界人士三十多人。參閱《周恩來年譜》，1945年1月26、28日，頁598-599。

<sup>93</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27日記事，頁18-19。

<sup>94</sup> 孫科當晚邀請請周恩來、左舜生、黃炎培、張伯鈞、李璜等，及國民黨方面的王世杰、邵子力和吳鐵城等。

<sup>95</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1月28日記事，頁16。

<sup>96</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1月30日，頁599。

<sup>97</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2月1日記事，頁21-22。

施政綱領，保證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來往自由等四條。」<sup>98</sup>王世杰與周恩來繼續商談，雙方互相交換草案，並有共識，「對於召集若干國民黨以外人員及無黨無派人員，開會協商一事，彼此已大體同意。」<sup>99</sup>王世杰表示爲了緩和局勢，應找一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當晚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蔣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黨派會議。」<sup>100</sup>

3日上午王世杰擬就協議草案，其內容爲：「召集一十餘人之會議，由國民政府召集，中共、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民主同盟各派一人至三、四人不等，並約其他無黨派人士數人參加，商議結束訓政、統一軍事及容納國民黨以外之人於政府之方案。」蔣介石認爲此方案可行，周恩來也表示將向延安請示。<sup>101</sup>

同日，毛致電周：「紅軍迫近柏林，各國人民及進步黨派聲勢大振。蘇聯參與東方事件可能性增長。在此種情形下，美、蔣均急於和我們求得政治妥協。」並要周明白告訴國民黨及小黨派：「除非明令廢止一黨專政，明令承認一切抗日黨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務機關及特務活動，准許人民有真正自由，釋放政治犯，撤銷封鎖，承認解放區，並組織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我們是很難參加政府的。」<sup>102</sup>

周恩來於5日致電毛澤東：「已準備了兩個方案，擬擇其中之一向蔣介石提出。一是堅持我方協定內容，另以口頭要求實行放人、撤兵、給自由、廢特務四條。第二案是將放人等四項加進協定中，再加黨派合作一項。……堅持第一案，以口頭提出四項會更有利。」<sup>103</sup>毛澤東同意周的構想並電告其注意：「(一)對王世杰提案不完全拒絕，只說可回延商討；(二)不要強調國是會議；(三)強調如無真民主，我們是萬難加入政府的。請于三、四天內探明各方真意後回延。」<sup>104</sup>

對於中國政局的發展，其他各黨派亦表關注，黃炎培在8日宴請孫科、王世杰、周恩來、王若飛、左舜生、李璜、沈鈞儒、張申府、章伯鈞、王昆侖、雷震等三方人士。宴中孫科贊成國共合作，提出各黨「共同訓政」的主張，王世杰則認爲國共問題的癥結在缺乏互信。<sup>105</sup>

9日周恩來會見赫爾利時，赫爾利轉告周有關王世杰所提政治諮詢會議的方案，周表示不能同意。<sup>106</sup>王世杰認爲：「延安對予所草擬之『政治諮詢會議』(周恩來原意爲黨派會議)向未能接受，但可考慮，並云彼奉召須先返延安一商。」王世杰認爲其所草擬的文件，大部分是周恩來所提議或已同意者，此舉讓王覺得，「周顯有藉詞推諉之意(或因周本無權提議新意或接受他人任何新提議，蓋中共權力實集中于毛澤東一人)」。 <sup>107</sup>

赫爾利、張治中、王世杰與周恩來於10日下午到宋子文宅邸繼續會商。周提議在召集黨派會議前，改善環境，先實現放人等四項主張。<sup>108</sup>赫爾利主張周與國民政府方面發表一個共同聲明，說明談判現狀。但周恩來反對。<sup>109</sup>赫此舉的用意是要避免國共談判破裂造成不利影響。

赫爾利在11日要周恩來共同起草一個聲明，並說將向羅斯福報告國共的看法已接近。但周

<sup>98</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2月2日，頁599。

<sup>99</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2月2日記事，頁22。

<sup>100</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2月2日，頁600。

<sup>101</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2月3日記事，頁22-23。

<sup>102</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5年2月3日，頁576。

<sup>103</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2月5日，頁601。

<sup>104</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5年2月5日，頁577。

<sup>105</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2月8日，頁601。及《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2月8日，頁26。

<sup>106</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2月9日，頁601。

<sup>107</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2月9日記事，頁26-27。

<sup>108</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2月10日，頁601。

<sup>109</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2月10日記事，頁27。

認為如果要發表聲明，就要說明國共雙方意見不同的地方。<sup>110</sup>毛澤東於 12 日電覆周恩來：「斷然拒絕赫爾利，完全正確。我們必須堅持八條，並先做四條，否則將長獨裁之志氣，滅民主之威風。」<sup>111</sup>

對於中共態度轉趨強硬的原因，蔣介石判斷：「俄國對我交涉遷延，中共態度轉劣，當受三國會議之影響也。」<sup>112</sup>。13 日上午蔣介石會見周恩來時，聲色俱厲的向周恩來表示：「(一)建國大綱所定之還政於民的程序不能變更，國民黨只能還政於未來之國民代表大會，不能將政權移交於中共所要求召集之『黨派會議』；(二)中共不能推翻國民黨或蔣先生本人，因此，必須與國民黨徹底合作。」<sup>113</sup>周恩來逐條予以反駁，態度亦倔強，赫爾利斡旋下的國共談判，至此又陷入僵局。

王世杰在 15 日特別就國共談判的破局召開記者會說明：「國民政府對提出的若干重要讓步：(一)承認共黨合法地位；(二)共黨參加軍委會；(三)各黨參加行政院；(四)組織三人委員會改組共軍部隊問題，均被拒絕了。」<sup>114</sup>周恩來於 16 日返回延安，赫爾利斡旋下的國共談判，再次以失敗收場。

## 柒、結語

赫爾利斡旋下的國共談判，雖然最後沒有達成具體的協定，但其斡旋的過程有許多經驗是相當獨特的。從《王世杰日記》中有關國共交涉的記載，也可以了解到談判代表內心的轉折，與更多檯面上無法看到的想法。

從本階段的國共談判歷程，可以發現隨著戰局的變化，國際強權對東亞的動向也在改變。當盟軍在歐洲戰場逐步取得勝利之後，原本無暇東顧的蘇俄，爲了擴大在中國的利益，打破和日本的協議。蘇俄的動態從而影響了美國在太平洋戰場的佈局，也促使國民政府在 1945 年 2 月初的談判，轉而採取較溫和的態度，試圖儘快獲得中共的確認，以免蘇俄日後介入或是公開支持中共而衍生更多的困擾。

中共陣營也深知美國希望國共合作抗日的想法，並且因美國在太平洋戰場逐步取得主控權，不排除可能在中國沿海登陸，與中國的軍隊夾擊日軍。中共當時在沿海地區握有較多的軍隊，其因此企圖透過談判以得到美國更多的資助，或甚至承認其政治地位。

當時由於國民政府軍隊在豫湘桂的連番挫敗而元氣大傷，反觀中共卻仍持續擴大軍隊的規模，彼此軍力的消長也反映在中共的談判態度上。故周恩來的態度日趨強硬，舉出更繁細的議案，讓國民政府陣營疲於應付。甚至最後只談要廢除一黨專政、組織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

擔任中共主談代表的周恩來常在雙方快取得共識時，又擴大其談判訴求，或以返回延安來迴避談論已取得共識的部份，讓赫爾利的斡旋沒能有所成果。當然這也使得赫爾利的態度漸趨向國民政府陣營。

其次就國共對談判議題的設定來看，中共陣營在 1944 年 9 月 15 日的參政會上，即藉由林祖涵在報告國共談判的經過時，將聯合政府的訴求提出，並與民主同盟「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張相呼應，而給國民政府陣營造成壓力。其後更把議題扣緊在政權、軍權和資源

<sup>110</sup> 《周恩來年譜》，1945年2月11日，頁602。

<sup>111</sup> 《毛澤東年譜》中卷，1945年2月12日，頁578-579。

<sup>112</sup> 三國會議即雅爾塔會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4），頁302。

<sup>113</sup>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1945年2月14日記事，頁29-30。

<sup>114</sup>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5年2月15日記事，頁452。

分配上，並以改組政府，成立「聯合國民政府」和「聯合國民軍事委員會」持續作訴求。雖然蔣介石以提早召開國民大會和成立「戰時內閣」來回應，但內容並不具體，較缺乏說服力。從國共雙方在 1944 年 11 月間的談判提案來看(參閱表一)，雙方雖然再談判目標上有一致的看法，但在政府和軍事組織上，亦即政權和軍權的規劃上卻有截然不同的思考，國民政府陣營想藉機收編中共軍隊，中共陣營則想名正言順的分享政權和軍權。赫爾利由於未能認清國共提案的根本差異，使得其周旋雙方的努力終歸徒勞無功。

表一、國共談判提案比較表

談判提案 談判議題	國民政府提案 11月7日 協議之基本條件	中國共產黨提案 11月10日 赫爾利從延安帶回的協定譯文	國民政府提案 11月19日
談判目標	1. 中央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合作，求得國內軍隊之統一，期能迅速擊敗日本，並建設中國。 2. 擁護孫中山之主義，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	1. 統一中國所有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2. 聯合國民政府擁護孫總理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	1. 為達成中國境內軍事力量之集中與統一，以期實現迅速擊潰日本，及戰後建國之目的。 2. 促進民主化政治之進步及其發展之政策。
政府組織	中國僅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及一個軍隊。	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黨代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代表。	
政黨地位	中央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並使之為合法之政黨，所有在國內之各政黨，將予以合法之地位。	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之合法地位。	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為合法政黨。
軍事組織	1. 中共軍隊應接受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之命令。 2. 中共軍隊之官兵經中央政府編定後，將依其職階享受與國軍相同之待遇，其各單位對於軍火及軍需品之分配，亦將享受相等之待遇。	1. 軍事委員會應同時改組為聯合國民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組成之。 2. 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國民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令。自外國取得之供應品，應公平分配之。	1. 將中共軍隊加以整編，列為正規國軍，其經費、餉項、軍械及其他補給與其他部隊受同等待遇。 2. 中共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 3. 國民政府並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事委員會。
自由權保障		建立正義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所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之自由兩種權利，實行有效。	除為有效對日作戰之安全所必需者外，將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對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

資料來源： 1.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4），（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頁289-296。  
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44年5月—1945年1月國共談判史料(續)〉，《民國檔案》第3期，（南京：民國檔案雜誌社，1994年），頁29。

第三，就國共各自陣營內部對談判的看法，中共陣營從毛澤東幕後坐鎮，到周恩來、林祖涵、董必武等上談判桌折衝，未聞有不同意見者。但國民政府陣營在處理談判議題上，則時有意見相左之處。

第四，由於赫爾利以第三者的身分斡旋，國共雙方爲了爭取美國的支持，多少會在談判上有配合動作，但是在議題上處處設限或是提出對方無法接受的條件，缺乏真誠解決問題，對化解國共雙方的歧見並無大助益。

第五，本階段談判因有赫爾利的參與，其過程相對較公開，也較吸引媒體及大眾的注意。若就談判宣傳的部份來看，中共談判陣營在 1944 年 7 月讓美軍觀察組(USAOG — U. S. Army Observer Group)進駐延安，8 月間持續函邀國民政府陣營赴延安談判，無論是在會議和媒體上均大力鼓吹民主、自由議題，拉攏民盟等第三勢力，此皆使其在形象上爭取到不少支持。

第六、由於本階段的談判都是「代理人談判」，真正擁有決策權的領導人都隱於幕後，而談判代表在授權有限的情形下，很難就談判議題做實質和深入的交涉，因此不易有令人滿意的結果。

最後，本次談判的議題內容，大部分爲因應對手策略或隨時局演變而改變的權宜之計，缺乏讓國家長治久安的規劃。在此權謀大於治國用心的氛圍下，國共雙方很難真誠進行協議，赫爾利的斡旋也只能無功而返。